

他者的变奏：早期社会学中国化的脉络与流变

何祎金

内容提要：结合历史情境，本文梳理和考察了早期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与流变，不仅关注狭义的中国化，即在20世纪30年代明确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知识计划，同时关注那些缺少中国化提法，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为社会学注入了中国理解和阐释的广义中国化。后者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完整历史谱系中，显然不应该缺席。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化的内涵亦发生了相应的流变。这种流变不仅反映了历史上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时反映的还有彼时社会学在中国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并存的张力。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中国化；他者；流变

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上，社会学中国化的命题构成了重要的历史篇章。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和吴文藻等前辈学者，明确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主张。强调立足于中国社会，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中国固有的实际，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降，以社区研究为内核的中国化实践，为中国社会学赢得了世界声誉，西方学界亦有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之提法。乃至在世界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上，中国社会学前辈们的工作卓有成效且功不可没（郑杭生，2000）。在阎明看来，将西方的社会理论与方法，有效地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是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学学者所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阎明，2004：147）。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在长时段的学科发展中，中国化贯穿在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实践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化是一个陈旧或者过时的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截然不同的历史情境，社会学中国化的内涵和取向也存在差别。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2012）回顾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化，旨在建立属于中国的社会科学，运用社会科学知识研究中国社会，它表现为一种社会学的国内化（domestication）；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由港台和美国华人学者引导的中国化，其目的是在社会学理论中发出中国的声音；^①第三个阶段则是20世纪90

作者简介：何祎金，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历史与政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殖民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比较研究”（17CSH001）。

^① 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学中国化表现为一种跨地区的学术运动，中国台湾、香港、大陆、新加坡和北美的华人学者都有参与。在这一时期，港台学者和北美华人学者是中国化议题的主要发起者，代表人物有金耀基、文崇一、杨国枢、叶启政和林南等人。彼时大陆社会学刚恢复重建，因为学术中断期的存在，大陆学者并不是这一时期中国化的主要发起者。

年代以降,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以及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学成为流行思潮,学科中国化的讨论趋于丰富且多元。

时至今日,建设一门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社会学依然是当代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与学术追求。本土学者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对这一知识计划的实践和达成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方案。在学科的当代发展上,一些学者将增强建设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作为发展方向(宋林飞,2016;李友梅,2017;洪大用,2018;张翼,2018)。在中国化的实现路径上,强调本土概念和中国漫长深厚学术传统的对接,尤其是在社会学层面,以行动伦理来连接经验现象与中国文化传统(周飞舟,2018)。并且,王宁(2017)对本土化议题的制度主义分析,指出这不仅是社会学内部视角的理论和认识论问题,它还涉及学术制度与文化,后者影响了我们的知识创新力,亦是本土化成效不彰的缘由。此外,有学者从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三个方面入手,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要走出这一误区,需要参与世界社会科学的对话与竞争(谢宇,2018)。赵旭东(2018)则提出了多元文明之间相互交融与彼此共在的开放本土化,以超越那种封闭的极端本土化主张。可以看到,相关议题下学者产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亦存在热烈的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学科中国化和本土化并不是一个完全现在时或者将来时的计划,它还包括我们对学科历史的回访与反思。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化的追求,它的起伏和流变为当代的学科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参照。本文对早期中国化历史的回访,关注的焦点并不限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学中国化。回顾历史会发现,在明确提出中国化的计划之前,立足中国社会,追求一门与本土社会相关联的社会学,或明或暗地贯穿在这门学科的中国发展史中。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许多学者的学术实践,在理论和方法论选择、学科定位和属性上注入了中国的理解和阐释,并在历史实践中为这门学科加入了中国属性。这种广义的中国化实践,虽然缺少明确的提法,却具备了中国化的实际内涵。因而,对于德里克所谓第一个阶段中国化的提法,在时间纵深上可以继续向前延伸至新文化运动时期。^①

对社会学知识生产的考察,默顿认为社会学的真实历史,应该包括社会学概念的复杂谱系,它们的发展方式,理论与社会学组织的互动,其传播和变化,以及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对它们的影响(Merton,1967:2)。此外,对于知识分子及其学术实践的分析,布迪厄式的考察会侧重解读学术领域中制度环境的重要作用,以及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Bourdieu,1988)。在中国情境下,社会学中国化并不是在孤立环境中形成的理论观点,它本身是中西文化遭遇和碰撞的产物,深深地嵌入于20世纪早期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学术场域中,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追求与塑造,使得这一计划本身也成为一种本土学者相互竞逐的象征资本。这不仅发生在社会学内部,还发生在社会学与其他学科和思潮之间。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化的内涵亦发生了相应的流变。这种流变不仅反映了历史上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时反映的还有彼时社会学在中国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并存的张力。这也意味着社

① 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中国化讨论中,有学者指出中国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研究者选取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描述和解释社会事实与规律的时候,社会学研究已经中国化了(张德胜,1985)。按照这种观点,清末严复和康有为等人的社会学思想便属于一种中国化实践。本文对早期社会学中国化的考察,侧重关注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实践,以区别于传统文人的学术思想。事实上,两种类型的学者,其学术实践也有很大的区别。费孝通认为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方法存在鲜明对比,他理解严复将洋货加以汉化的苦心,后者从中国原有的概念中套取西洋的思想,这种尝试虽然成功,但是方法却没有传承下来(费孝通,1947)。当然,这里的差异并非绝对意义的断裂,中国社会学的实用主义特征便被认为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特点(Maykovich,1987)。在历史的动态中,传统思想文化与社会学研究之间的断裂和延绵,乃至将桥接历史当作中国化的一种方案可以另立新论探讨。

会学的中国化不但需要面对西方“他者”的问题，它还需要面对来自本土“他者”的竞争与挑战。

在历史情境中，中国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关于西方理论和方法如何在中国实践的知识和学术问题，它还涉及社会学作为一种现代性计划，对学科认同和功能的定位与想象。新文化运动中对社会调查的呐喊，呼吁以“事实”来启蒙民众，代表了彼时诸种现代性思潮中的社会学之声。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中国主义(Chinaism)的提法，提倡对中国社会进行科学研究，同时也是对新文化运动中各种竞争性思潮与主张的社会学回应。30年代以社区研究为内核的中国化，亦希冀以有理论假设的社会学研究，来取代缺少理论的调查研究与经验描述。此外，孙本文在40年代拓展的中国化是一个未完成的知识计划，学科发展的历程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相互联系与交织在一起。社会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知识计划，调适和阐释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土壤和社会情境下的张力并不是这一任务的全部内涵，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复合多元的知识任务。

并且，表面上看，“中国化”的提法表达了文化排他性的价值取向，但是不同于后殖民社会学对西方“他者”的挾伐与祛除，在中国语境下，中国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并没有表现为简单的二元互斥或者对抗性关系。一方面，作为结合本土情境需要的知识计划，西方社会学成为可以调用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本土学者的中国化追求亦表现为一种跨文化的社会学实践，需要在两种文化之间理解、想象、协商和阐释这门学科。这注定了社会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知识计划或者学术任务，它同时要求我们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来考察中国化的发生与流变。在音乐术语中，“变奏”一词指在乐曲的基本框架之外进行发挥。可以通过改变旋律、律动、速度乃至结构来进行乐曲变奏。如果我们将中国化的知识计划理解为一支集体演奏的乐曲，那么在中国化这一复合多元的主题之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段，面对他者的变化，亦为这支社会学中国化的乐曲带来了变奏的可能。

一、新文化运动中的社会学：社会调查的政治

在西方社会学起源的叙事中，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为社会学的学科认同提供了重要的象征资源，成为社会学在西方兴起的重要背景。在中国情境下，虽然缺少欧洲那样的双重革命，但是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对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西方和中国的讨论，亦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实践无法回避的历史情境。

1936年的《新术语辞典》将五四运动解释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认为五四之后新刊纷纷出版，大都是攻击旧礼教，提倡白话文，介绍西洋文化。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吴念慈、柯柏年、王慎名，1936：18）。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61)象征性地将“五四”称为孔子的忌日，以示传统文化所遭遇的空前否定。另一种看法将1915年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标志性事件是《新青年》的创刊，成为这场运动的旗舰杂志。在第一期的杂志上，陈独秀以《敬告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战斗檄文。开篇将中国社会比喻成新陈代谢的有机体，中国青年比喻成新鲜活泼的细胞，如任陈腐朽败分子充塞社会则将导致社会的灭亡。故提出六义敬告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1915）。新文化运动宣扬民主与科学，批判封建帝制与文化对中国现代化构成的阻碍。对封建传统与保守力量的批判，由此拉开序幕。

考虑到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作为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分界点，这场中国的文艺复兴对社

会学而言,似乎应该具有欧洲双重革命那样的象征意义。然而,在大部分的学科史研究中,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被塑造成重要的历史时刻,更难言将其视为学科认同的重要来源。但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会发现,社会学并没有缺席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在阎明的学科史专著中,封底有这样一段文字:“人们耳熟能详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但一般不知道还有社会学家陶孟和。大家都很熟悉‘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而不了解‘社会调查运动’。”(阎明,2004)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彼时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受到这场席卷全国的文化运动的影响,需要做出应对之举,甚至本身与之合流;另一方面,社会学在这场运动中持有独特的立场。面对新文化运动中大量涌现的西方思潮,社会学在追求塑造现代中国的目的和价值上与前者保持一致,同时又亟须在稍显纷乱的各种主义和思潮中塑造自身的学科认同与合法性。

1918年,陶孟和署名陶履恭,在《新青年》上投文倡导在中国推行社会调查。事实上,这篇名为《社会调查导言》的文章,更像是一篇社会调查的政治宣言。作为社会学标志性的研究方法,陶孟和给社会调查注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特征。在对封建文化与传统保守力量的批判中,赋予其启蒙大众与反抗封建政治的功能,并提倡这种方法的全国推广。相比于文化领域的白话文运动或者文学革命,社会学的方法特征凸显出来,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股特殊的力量。

从其伦敦求学的经历讲起,陶孟和发现从《史记》到地方志,缺少人民生活的文字记录。固有的书籍多用铺张扬厉的笔法记录英雄恶霸的故事,或以不合理的文笔发表不合理的想象,又如如胡适所谓的“奴性逻辑”来解释陈言,成为古人的奴隶。这也是封建愚民政治的根基,法律和政制都托圣人的旨意来制定,圣人不死,便待人民如聋如哑,如痴如盲(陶孟和,1918:223)。为了清除这种“贤人政治”,将民众从偏见和无知中解放出来,陶孟和提倡用社会调查来明辨社会现象的美点与弊病,使得一般人民可以成为自身的圣贤,更使得愚民政治再无可行的空间。在新文化运动的旗舰杂志上鼓噪,陶孟和的声音代表了社会学在这场运动中的在场。陶孟和的解读侧重调查的政治与价值功能,这一方法也成为特殊的反封建武器。“一国之中,不贵在有尧舜禹汤,而贵在一般人民都能发达”(陶孟和,1918:223),将普通人民与日常生活带入历史的记录与书写,这点与通过经验研究来建立西方社会学与本土社会的关联性存在不同。不仅如此,在早期本土学者对社会调查的解读中,这种方法与本土学者的民族认同与爱国热情存在密切的联系。

李景汉是推行社会调查的另一位先锋,与陶孟和一样,他追忆了在美国求学期间,社会调查数据匮乏给他带来的“国耻”。最初在上课时,李景汉喜欢坐在教室前排。但是当老师问到中国人口分配、生命统计、土地关系等统计数据的时候,因为无法作答而汗流浹背、如坐针毡,于是慢慢将座位移到最后一排。因为这段经历颇受刺激,李景汉将此视为自己立志从事社会调查的原因之一(李景汉,1932)。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国家或者殖民者所主导的人口普查、制图术和各类调查实践,作为一种权力制度,不仅提供了殖民地政府对其治理对象和治理空间的想象,还在殖民地的治理机制下被赋予真实社会生活的内容,它们本身也被视为一种民族主义叙事,为民众提供了想象共同体的来源(安德森,2016:159-165)。这种因为“科学”叙事的缺憾所带来的“国耻”,在李景汉这里同样引起了民族情绪,亦成为其念兹在兹要在中国从事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缘由。

20世纪30年代的李景汉虽然像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陶孟和那样,认为社会调查可以在只有民国而无国民的时代,发挥启蒙作用,普及公民常识、提高人民的公共精神。但是另一方面,李景汉又强调社会调查的建设性,与同时代其他激进思潮带来的破坏性进行区别。李景汉认为,在囫圇吞枣的拼命模仿西洋,甚至

东洋；在孔子打倒，礼教打倒，万年迷信打倒，马褂打倒，反动打倒，知识阶级打倒的时代，“夫社会调查非胡乱破坏之工作而是致力建设之工作也”（李景汉，1932：691）。当然，在社会运动剧烈的历史时期，李景汉澄清自己并非不主张打倒，而是认为需要先行调查，以弄清楚何者应该打倒、如何打倒和打倒之步骤。在他看来，我们真正缺乏的却是冷静的态度、科学的思维和精密的研究。只有通过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寻出病根再图建设的方法，才是建设国家和民族自救的出路。

在社会运动、社会改良，乃至社会革命中，社会调查提供的“事实”是行动的基础性前提。吴景超亦提到了社会运动必须建立在稳固的事实之上。但是，在他的时代，和民生最有关联的事实，现在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参考，这也是中国文献界的一大耻辱（吴景超，1933：15）。吴景超提出以每五年或者十年进行一次的社会调查来取代每六十年进行一次县志编纂，以为社会改良和建设提供科学的事实基础，甚至提议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将这种调查实践当作国家机制的一部分。它需要一个县域调查的通用模版，在全国范围同时展开，并在时间节奏上与西方的人口普查一致。

从陶孟和到李景汉和吴景超，对社会调查的阐释，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与启蒙，过渡到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与建设，并强调与新文化运动以降诸种模仿与打倒的思潮形成区别。可以看到，在中国情境下，社会调查并不是纯粹的收集资料与呈现经验事实的方法或者工具。彼时中国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数据与事实的缺乏，不仅激发了学者的民族感情，社会调查更被视为一种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必备机制。吴景超以社会调查取代县志编纂，并不仅仅是方法和调查内容上的更替，通过提议在各县政府或者教育局下，设立由中央统计局监督的县志局，吴景超设计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科层化机制来实现这种更替（吴景超，1933：17）。社会调查的政治便在于此，它在历史实践中被本土学者赋予不同的政治功能与想象，不仅是方法工具，亦成为一种批判旧传统的思想武器，乃至设想通过它来构筑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基础。^①另一方面，虽然没有中国化的提法，但是在历史情境中，社会调查的政治显然体现了丰富的中国内涵与属性。

二、中国化的另一种表达：中国主义与社会学运动

新文化运动固然促进了民众对新事物的接受，但是也带来了新思潮林立与纷争的乱象。这种状况颇似孔德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批判，在由形而上学阶段向实证阶段过渡的中间时期，存在知识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对中国社会学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亟须确立和巩固自己的学科认同。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外国观察者，主持过北京调查的甘博和步济时便指出中国教授们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并没有顾及它们与家庭、工业和国家的关系。他们也许短期改变了中国的思想生活，但是却并非实际的项目，甚至存在过度依赖西方社会理论的危险。他们认为这些在西方工业社会情境中发展出来的理论，除非经过试验与修改，否则将不适用于中国（Gamble & Burgess, 1921：26）。

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氛围中，尚在发育的中国社会学显然难以屏蔽这场声势浩大运动的影响。蔡骥

① 至20世纪30年代，社会调查在中国已经蔚成风气。社会学中国化亦体现在了社会调查技术在中国土壤与田野的历史实践中。事实上，在陶孟和早期的人力车夫调查和北平生活费调查中，在方法的实践上，并不是完全地对西方社会调查进行技术复制。它需要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在调查员的选择、方法的展开上进行调适。如调查家庭日用账的时候，对女性调查员的使用，以及和被调查者之间建立信任（陶孟和，2011：8）。这里的方法调适，反映了技术实践里的中国化特点。但是本部分对社会调查的分析，更多地强调方法在历史情境中被赋予的政治功能和想象。

敏指出新文化运动与社会学的发展存在两点关联:一方面,存在将新事物当作好事物的趋向。只要是新的思想,不管哪派都被介绍进来;另一方面,对社会问题的讨论成为潮流。新事物与新潮流,上述两点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蔡毓骢,1931)。杨堃亦认为五四运动之后,社会思想在中国青年界拥有极大的权威,社会科学亦成了最时髦的学科。教科书式的社会学为了迎合这种需要,大量刊行。这里所谓教科书式的社会学,即指严复的翻译启蒙之后,应学校需要编译出版的西方社会学教材。但是,杨堃认为教科书式的社会学在这一时期,大半是东译西抄,杂凑而成,不仅谈不上编者的个人创建,即便是叙述别人的学说,也是不加组织、人云亦云(杨堃,1932:49)。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的计划中,对与中国社会实际脱节的国外社会学教材与书籍盲从的批判,亦是一项重要的前提。

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献中,杨堃从三十年来中国出版界的状况窥测社会学的进展。中国社会学被划分为:萌芽期、宣传期、学派期和建设期四个阶段。杨堃将宣传期的起点定为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的时期,认为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学的促进助力颇多,大量的社会学书籍出版,始于这一时期。尤其《新青年》的发行,对中国思想造成的鼓动,对社会学运动的发展亦有间接影响(杨堃,1943)。可以看到,对于五四或者新文化运动,学者大多承认其对外部环境的培育,为社会学书籍或者思潮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乃至新文化运动成了学科分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新文化运动虽然培育了社会科学思想传播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社会学的发展亦可以从中受益,但是时髦背后还存在诸多不利局面。新思潮和诸种主义的涌现和竞争,其中不乏激进者,这对社会学的学科认同与合法性提出了问题。显然,单纯地强调社会学作为一门西方的现代学科,无助于社会学家们在这场百舸争流的竞争中取胜,如何给这门学科注入中国属性,并使之区别于林立的西方思潮与主义,成为彼时社会学学者的学术任务与挑战。

1922年,留美学者余天休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学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社会学团体。在成立大会的演讲中,余天休做了题为《中国社会学家之目的与责任》的演讲。他指出当前中国学术之大不幸在于不注意研究中国社会情形,而盲从各种“主义”。并且,中国人不应随意吞取外来之主义,应当依中国的社会情形立论,以实行我中国自己之主义,即:中国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家的目的与责任在于两个原则:用科学的精神做真正的研究;用科学的精神批评外国传播的种种主义(余天休,1922)。第一点涉及本土学者展开研究实践的基本准则,要求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这种面向本土社会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计划中,依然被当作一项核心工作。第二点要求容易受到研究者的忽视,它代表了彼时中国化社会学的独特之处。需要在各种炫目的思潮和主义中,将批判的理论工作视为本土学者的基本责任,以推行符合中国实际的“主义”。

“中国主义”的提法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它同时又预示了社会学与新文化运动之间暧昧的关系。传播科学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内容,种种主义则是运动带来的后果,社会学本身亦可归为外来主义的一种。余天休并没有调解这里可能存在的矛盾,作为一门舶来的学科,诸种西学中的一分子,社会学的西方性和他者性被回避了,它本身被塑造成了一种主义参与同其他思潮的对抗和竞争,后者也构成了中国社会学需要面对的他者。但是,我者与他者的关系在这里并不是就“中国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而言。换言之,“中国主义”所针对的对象并不是“西方社会学”,而在于“中国社会学”与其他在中国的西方思潮与主义。因而,这一阶段的中国化表现为一种内部的目标和策略,与当代后殖民社会学对社会学西方内涵和假设的解构与批判存在差异。

此外,在另一种叙事中,社会学本身在中国的进展被描述为一场运动。留美学者、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首位中国籍系主任许仕廉(Leonard Shih-lien Hsu)在介绍中国社会学的时候,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经过概括为一场有前途和希望的社会学运动。许仕廉甚至将这运动的源头追溯到了严复以及朱友渔,前者是西方社会学输入中国的起点,后者则是中国留学生中最早主修社会学者。

许仕廉将运动解释为受环境刺激,谋应付生活需要的群众行为,中国的社会学运动亦由此而来。它需要面对中国的社会崩坏与民生痛苦,其目的和意义在于重塑一个现代中国。在这一论述中,社会学成为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主动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许仕廉对这场运动的阐释,存在一个理论前提。他将社会变迁由低到高分五期:原始社会、部落社会、封建社会、公民社会和职业社会。认为西方与日本诸强已经进入了第五期,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却极不均衡,不同地域之间各期并存。并且,处在第三期和第四期的中国社会与第五期的社会竞争,必然会弱不敌强、处处失败。而中国一切的痛苦,在于我们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态度不能应付外在的社会变迁(许仕廉,1931)。^①这种阐释拓展了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社会变迁的内部文化失调问题,成为落后社会形态与高级社会形态之间的文化堕距问题。为了应对外在社会变迁的需要,社会学被当作了临危受命的学科。

在许仕廉看来,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变迁原则的学问,可以发明新的方法制度去适应新的变迁。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在理论上根据科学方法收集和分析事实,寻求社会变迁的法则;在应用上则根据科学原则发明社会统治的技术,利用环境改进人群的生活。许仕廉认为“革命”虽然成为中国青年的口头禅,但是它并不仅仅是打碎旧世界,而是一个重塑当前社会,使其适应新环境力量的过程。在这项重塑社会的工作中,社会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为理解社会问题提供专家知识,更为社会重组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

许仕廉对社会变迁的分期含有进化论的色彩,中国社会在这一分期中的独特位置构成了社会学运动在中国展开的必要前提。虽然社会学在这里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理论取向,但是许仕廉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和阐释,亦是以他所理解的中国社会实际作为出发点,并非盲目地空谈西方社会学。另一方面,当社会学独立成一场运动的时候,它与拥有诸多内涵的新文化运动形成了区别。与甘博和步济时等人的看法类似,新文化运动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看来,并不成功。在章渊若所建立的致力于改变中国的运动谱系中,维新运动无补时艰、新文化运动亦昙花一现。尤其是后者,如果盲目地厌旧和趋新,非但旧势力未扫除,却会带来精神和物质上的新恐慌(章渊若,1931)。因而,他提倡以社会科学运动来复兴中国民族的新生命。

此外,社会学运动或者社会学的中国主义,都强调这门学科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许仕廉在社会进化论的图谱中确立了中国社会特殊的位置,而后才有了运动的展开。余天休提倡中国主义的时候,亦在开篇强调中国社会学家之目的,必须具有了解中国人民之识力。只有理解了自己,才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坚实基础。并且中国幅员辽阔,语言文化和风俗宗教都与欧洲不同。余天休认为的中国实际在于,我们盲目追求的各种主义,是20世纪的哲理,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尚处在19世纪,它们之间并不兼容。余天休的认识论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色彩,面对物质经济基础与思想观念之间的张力,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唯有立足实际,实行自己的中国主义。

余天休和许仕廉的努力,在不同阶段,构成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另一种表达。需要注意的是,在立足中

^① 许仕廉还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经过,该文的英文版发表在1931年的《太平洋季刊》(*Pacific Affairs*)上(Hsu, 1931)。

国社会现实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同时指出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或者一种中国社会的例外论(exceptionalism)。在与西方共时的20世纪,它是第三期与第四期形态混合的中国社会,且经济条件尚停滞在19世纪。这种例外论和特殊性,也是社会学在中国展开时无法回避的现实基础。在这里,中国化的中国社会学需要面对两个他者。一个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西方;另一个是在历史情境中流行的诸种思潮和主义。前者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的特殊位置;后者对应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

事实上,在学科中国化的知识计划中,不仅应包括具体的理论和方法论选择与实践,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和阐释亦构成了重要内容。中国化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计划,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理解,成为彼时学者选择和调适西方社会学的重要依据。余天休的社会学中国主义与许仕廉的中国社会学运动,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阐释铺垫了这门学科展开实践的前提基础,它们虽无中国化的名称,却代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另一种表达。

三、中国化的明确主张:实地调查与社区研究

随着社会学知识的传播,社会学制度化建设的展开,这门学科在中国逐步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位置。作为一门舶来的学科,如何与中国社会建立关联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学教科书的选择与编写上,东译西抄、杂凑而成、与中国现实毫无关联的问题已经为本土学者所意识到。转向中国社会本身,关注本土问题的研究,学者们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明确主张。

1925年,许仕廉通过对社会学教程的研究,批评了这门学科在中国存在的诸多弊端。开篇便为社会学正名,指出存在将社会学混同为哲学与心理学的现象。此外,还包括系统性缺乏、抄袭外国材料、不注重实地调查、不注重应用性的社会服务等问题。许仕廉认为,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各科教材的缺乏,所抄袭的教材,并不符合国内的情形。欧美社会问题由工业、商业引出,中国尚在手工时代,当存在自身的问题。许仕廉提议以立足本土社会情形为前提,不仅需要在社会学教材中注入中国社会的内容,更尝试在教学与应用之间建立联合(许仕廉,1925)。此时虽无中国化的提法,但侧重本土社会研究及实践的意图非常明显。杨堃亦有相似的看法,认为经由教科书式的社会学之后,随着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文化学派、马克思主义派和法国社会学派三个派别。虽然还只停留在介绍时期,但是中国社会学的进展存在经由介绍时期进入创作的可能,需要采用外国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垦社会学之中国化园地(杨堃,1932b:79)。

1930年2月,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成立,并举办了第一次年会。孙本文当选为正理事,在会上做了题为《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他回顾了社会学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将发展史分为萌芽时期、建设时期和进展时期三个阶段。前两个时期,社会学完成了引入及制度化建设,学社的成立则被当作进展时期的开端。在建设时期的基础上,孙本文提出了社会学基本工作的四个方向:首先,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名著及欧美重要学说及方法;其次,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学史料;再次,实地研究中国社会之特征;最后,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孙本文,2012:236)。中国化的主张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它需要采用欧美社会学的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制度,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社会学。在孙文本谓之“今后之急务”中,欧美社会学不仅在中国化中在场,更承担了方法和理论提供者的角色。

吴文藻是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另一位代表人物。20世纪40年代,吴文藻主编了《社会学丛刊》,虽名

为丛刊,但实为一套丛书,翻译和出版了国内外学者的学术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在《总序》中,吴文藻介绍了丛书发行的两种信念及要求:首先是促使社会学之中国化,以发挥中国社会学之特长;其次是供给社会学的基本参考书,辅助大学教材的不足。在吴文藻后期撰写的自传中,这篇总序视为其中国化主张之开端(吴文藻,1982)。在吴文藻介绍中国化的缘由中,社会学在大学中完成制度化,不到三十年的历史。经历了“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国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亦有稍取本国材料者。又继而由国人用本国文字讲述本国材料”的阶段(吴文藻,2010:3)。此外存在将社会问题、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混同为社会学研究的现象。吴文藻认为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属于一种变相的舶来品。

事实上,自许仕廉、孙本文到吴文藻,为社会学正名、加强社会学书籍和教材的出版、对实地研究的强调一直以来都是关注的重点。在吴文藻的时代,社会调查与统计已经蔚为风气,大家收集并尊重事实。他批评了将“测量”等同于科学,以及认为实地调查启动前无须理论假设的两种谬误。并由此引出了中国化的基本立场:以科学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现实的社会学才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在具体的规划中,吴文藻对丛书的分类,本身便充分体现了其对中国化所做的安排。这套丛书计划分为甲乙丙三集:甲集为纲领性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乙集为国内乡镇社区的调查报告;丙集为边疆社区的调查报告。其中,社会史的地位略显尴尬,它成为计划外拟定的丁集候补。尽管在吴文藻的计划中,他并没有对社会史之于中国化的作用及意义进行详细阐释;但此四集的安排,大体上遵循了孙本文所提的中国化思想。^①

但是,相比于孙本文对中国化的总体性论述,吴文藻的主张在理论和方法论选择上加入了具体的内核。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即为纲领性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以功能的观点考察现代社区,整体性地考察社区内的全部社会生活,并视此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为密切相关的一个统一体系的各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实地研究中国的城镇与边疆的社区,从而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从理论和方法论的选择到不同范围研究对象的确立,吴文藻提供了一套思路清晰的中国化系统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化的展开并不是简单的理论和知识计划,它还是一个教育和人才计划。吴文藻的中国化主张还提到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遵循前述的基本立场,以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理论与事实的有机结合固然会使一门科学在异域的土壤中落地生根,但是实现人才的培养和独立的研究才算彻底。在中国社会科学的规划和建设上,吴文藻是早期学者中颇有见地的一位,曾从人才、经费和组织三方面探讨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建设,认为这三者相益相成,缺一不可,是发展科学的基本要素。吴文藻对学生的培养,亦是其社会学教育思想的直接体现(吴文藻,1990:251)。历史上,费孝通、李安宅、林耀华、翟同祖和黄迪等弟子,在吴文藻有计划和针对性的周密安排下,分赴美国与欧洲“取经”。这批学者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骨干,在国际学界取得的成绩亦有“中国学派”的提法,书写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一段辉煌的历史。

此外,学科史的书写也构成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维度。20世纪40年代末,孙本文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学》是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学科史著作。表面上看,“当代”与“历史”区别甚大。在序言中,孙本文

^① 甲集包括费孝通撰写的《生育制度》,以及其翻译马林诺夫斯基所著的《文化论》和费斯所著的《人文类型》等书籍。乙集包括林耀华的《梁山夷家》、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等调查研究的成果。

开篇便做出解释,指出当代社会学似应限于现时流行的中国社会学,但它需由过去演进而来。并且,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近五十年,奠定早期社会学基础的人,亦是当代学者。因而孙本文认为此书实属一部中国社会学的简史(孙本文,1948:1)。换言之,这是亲历者所书写的活的学科史。

孙本文在书末展望了未来中国社会学的工作:首先是理论社会学的建立,并致力于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其次是中国应用社会学的建立,建设一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社会学;最后是社会学人才的训练。其中,对第一项工作的论述最为详细,又细分了若干子项。较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化论述,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排在了第一位,随后是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征和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创建一种完全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需要充分收集整理本国固有的社会学材料,再结合欧美社会学精深的理论来进行(孙本文,1948:284)。在这项计划中,欧美社会学始终都是中国化计划中的重要因素。

可以看到,进入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便已有了中国化的明确主张,这一知识计划甚至包含了具体的内容和步骤。扭转西方社会学书籍的独占性局面,加入中国的材料与内容,建立西方社会学与本土社会的关联性是主要的目标。在当代学者看来,这一时期的中国化,可以概括为“完全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欧美社会学家的理论+中国固有的社会资料”,这种知识计划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其问题并不在于对中国现实和社会特点的忽视,而在于以承认欧美社会学的普遍有效性作为前提(周晓虹,2012:17)。毫无疑问,这种普遍有效性在当代社会学受到了质疑,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下。尽管这种形式的中国化可能在当代的评价中含有诸多局限,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仍表现出了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在40年代的中国,作为明确的知识计划,意图引导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四、结 语

本文考察了早期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与流变。自新文化运动已降,这门学科在中国的进展,与本土社会的历史情境紧密结合,社会学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注入了中国的理解和阐释。除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明确主张之外,回到历史情境中会发现,从反抗封建政治的社会调查到重塑现代中国的社会学运动,再从通过社会调查寻求民族出路、建设现代国家到中国社会学家生产自己的“中国主义”,中国属性贯穿在这门学科的历史实践中。它们虽然没有中国化的具体名称,但是行使的却是中国化之实际——在不同历史时期,它们都强调立足中国社会,用社会学研究生产中国社会的事实。这种广义的中国化,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完整历史谱系中,不应该被忽略掉。

表面上看,“中国化”应该含有文化排他性的价值取向,但是在中国化的施行计划中,中国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二元论式的对抗与互斥关系,即便是民族主义色彩表现得最为强烈的“中国主义”也是如此。作为舶来品,西方社会学的他者性并没有被本土学者当作对立物来看待。在孙本文的论述中,系统地介绍欧美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被当作中国化的一项基本工作,吴文藻则具体地将功能主义与社区研究作为中国化的理论内核。

对当代社会学而言,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化话语背后看似难以调和的复杂性、矛盾性与包容性的统一?后殖民研究的理论话语,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参照。在后殖民社会学的理论视阈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不能仅在某种文化内部发生,必须有一个“协商”的空间来达成临时的理解和共识。霍米·巴巴(Homi Bhabha)将这种居间的空间称为“第三空间”(third space)(Bhabha,1994:37)。在中

国和西方文化的间隙,呈现了一个居间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第三空间。在第三空间的文化间隙中,彼时的本土学者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对西方社会学的翻译、吸收、借用和调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跨文化的社会学实践。本土学者亦在这一开放的阐释空间中,完成了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解和想象,并在不同阶段,赋予这门学科不同的功能或者政治任务。

就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面相而言,这一知识计划不仅是一个化“他”为“我”的过程。“他”的存在,对“我”的认同及巩固提出了要求。并且在不同历史情境中,中国社会学的他者并不以一个固定的面貌出现。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氛围中,他者不仅包括一个现代的西方形象,反衬出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作为发展和建设社会学在中国的起点,亦包括在中国传播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科学其他诸领域,在共存和竞争的局面下,为中国社会学确立自身的认同和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另一方面,作为最直观的他者,西方社会学的在场,建立它与中国社会的关联性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在历史上,西方社会学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学亟须否定与推翻的对立物。这也构成了中国社会学与后殖民社会学之间的重要区别。后者在建立自己学科认同的时候,结合自身的殖民历史与记忆,需要将祛除作为他者的西方社会学当作目标,乃至去殖民化西方或者欧洲社会学。中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学各自所面对的不同历史情境,促成了这种差异的形成。事实上,对彼时中国社会学而言,西方社会学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学科创建时期,社会学要与哲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甚至是社会问题研究形成区别,巩固自己的学科领地。因而在中国化的话语中,强调以中国社会立论的同时,对西方社会学持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面对其他竞争性他者的时候,这种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本土学者在学科认同上的焦虑,为社会学正名。

参考文献: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6,《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蔡毓骢,1931,《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四个时期》,《社会学刊》第3期。
- 陈独秀,1915,《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期。
- 费孝通,1947,《中国社会学的长成》,《文讯月刊》第4期。
- 洪大用,2018,《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质与方向》,《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李景汉,1932,《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7-8期。
- 李友梅,2017,《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的建构及其艰巨性》,《社会学评论》第2期。
- 孙本文,1948,《当代中国社会学》,上海:胜利出版社。
- ,2012,《孙本文文集:第八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陶孟和,1918,《社会调查》,《新青年》第3期。
- ,2011,《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宁,2017,《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吴景超,1933,《中国县志的改造》,《独立评论》第60期。
- 吴念慈、柯柏年、王慎名,1936,《新术语辞典》,上海:南强书局。
- 吴文藻,2010,《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90,《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1982,《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第6期。
- 许仕廉,1925,《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社会学杂志》第4期。
- ,1931,《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社会学刊》第2期。
- 谢宇,2018,《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第2期。
- 阎明,2004,《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杨堃,1932a,《中国现代社会学之派别及趋势》,《鞭策周刊》第3期。

- , 1932b, 《中国现代社会学之派别及趋势(续)》, 《鞭策周刊》第4期。
- , 1943, 《中国近三十年来之出版界(社会学之部)》, 《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7期。
- 阎明, 2004,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 社会学在中国》,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余天休, 1922, 《中国社会学家之目的与责任》, 《社会学杂志》第1期。
- 张德胜, 1985, 《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累积性与本土化》, 乔健编《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汇编》,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 张翼, 2018, 《社会学的中国化、话语权与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 章渊若, 1930, 《社会科学运动与中国民族之新生命: 中国社会科学会之使命》, 《社会科学杂志》第4期。
- 郑杭生, 2000, 《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学海》第6期。
- 周飞舟, 2018, 《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 《社会学研究》第1期。
- 赵旭东, 2018, 《不走极端的本土化: 人类学对本土化争论的一种立场表达》, 《新视野》第4期。
- 周晓虹, 2012, 《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ierre, 1988.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rlik, Arif. 2012. “Zhongguohua: Worlding China the Cas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20th-Century China.” In Arif Dirlik, Guannan Li, Hsiao-peí Yen (ed),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ndigenis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40.
- Gamble, Sidney David., Burgess, Stewart. 1921. *Peking: A Social Surve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
- Hsu, Leonard Shil-lien. 1931. “The Sociological Movement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4(4).
- Levenson, J. R. 1961. “The Day Confucius Die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2).
- Maykovich Minako K. 1987. “Sociology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odern Sociology* 17(1).
- Merton, Robert K. 1967. *On Theoretical Sociology: Five Essays, Old and New*.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Variations of the Othernes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and Fluctuations of Sinicizing Sociology in China's Early Periods

HE Yi-j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trajectory and fluctuations of sinicizing sociology in China. An intact genealogy of the sinicizatio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some sociological practices imbued with Chinese understan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More importantly, the content of sinicization varied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se fluctuations not only reflect the 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ology, but also reflect the coexisted tension between Chinese soc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Key Words: Chinese Sociology; Sinicization; The Other; Fluctuations

(责任编辑: 齐亚强)